

丝路医药

编者按:两千多年前,张骞手持节杖,从汉国都长安出发,踏上茫茫无际的西行之路……驼铃声声,丝绸、茶叶、瓷器、香料、葡萄、胡麻等物品在途中交错,中国、中亚、南亚、北非、西亚及欧洲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相遇,上演了一幕幕丝路沿线文明交相辉映的篇章。“变则通,通则久”“一带一路”唱响了现代丝路之魂。鉴此,本刊特设“丝路医药”专栏,秉承丝路精神,为不同医药学派搭建展示智慧的平台,长安医派、敦煌医药……诸多医学流派熠熠生辉,不同医药成果定会在“丝路医药”栏目交流碰撞,产生火花。

延安时期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

辛智科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03)

辛智科



1952 年出生,男,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优秀中医工作者,全国优秀中医科技管理工作。兼任陕西省医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名老中医学学术经验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民间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高级职称评审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从事中医医史文献教学、科研和中医内科临床工作 50 年,擅长运用中医思维和古典经方治疗中医脾胃病、内科杂病、女性内分泌失调以及亚健康的中医疗调。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和参编学术著作 20 余部,获省级科技奖 3 项,承担省级科研课题 4 项。

摘 要:延安,曾经是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时期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健康工作,始终坚持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始终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中西医学并重,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形成卫生健康工作网络,等等。当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制定党的各项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当时经验,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很有必要。

关键词:延安时期;医药卫生;中医药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71(2020)01-0001-10

DOI:10.13424/j.cnki.mtcm.2020.01.001

Experience of Health Work in Yan'an

Xin Zhike

(Shaanxi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China 710003)

*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目(SZY-YLKYC-2018)

Abstract: Yan'an was once the se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rea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Mao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of the working people during their stay in Yan'an. They always adhered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health work,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combining prevention with control, and they always insisted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lways adhered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nd gradually, a health work network was formed. Many valuable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at that tim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arty's various health work policies.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mind the mission,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t that time, and build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health undert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Yan'an Period; health ca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49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结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得电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 1936 年到 1948 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延安和边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建国后我党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确定的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的。为了继承党在延安时期医药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总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医药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确有必要。现就当时卫生工作的十大经验分述于后。

1 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是发展人民医药卫生事业的根本保证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经济、文化、卫生极为落后的地方,疫病流行猖獗,缺医少药,人民贫苦交加。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民生命健康毫无保障。据 1949 年 7 月 23 日和 8 月 11 日从《解放日报》信息统计,志丹县候家河湾三年人口死亡率平均为 9.2%,延安市新正区死亡率达 10%。在死亡人口中婴儿之死亡较成人更大。据对志丹、安塞、子长部分地区的调查:188 个妇女共生婴儿 1028 个,死亡 645 个,死亡率达 67.2%,延安县 1944 年一至五月因传染病而致死者即达 2016 人,占全县人口的 3.2%。边区当时平均寿命只有 10 岁。生育率和死亡率均占当时世界第一位。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

北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高度重视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将卫生工作列入党和军队的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关心过问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解决卫生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1937 年边区政府成立后,就创办了边区医院。1937 年 3 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就曾作出规划,扩大红军卫生学校,培养卫生干部,增设医院,开展防病治病工作。1937 年 3 月 23 日《新中华报》刊载 1937 年 3 月在延安市开展了卫生运动周,1000 多人参加了大扫除活动。毛主席向参加大扫除活动的人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又号召说:“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作。”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使人们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

1939 年 1 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通过了崔曙光、罗成德等十八人提出的《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提案说:“卫生保健工作,亟应建立的必要。”并依据边区实际提出护林植树调节气候,提高人民卫生知识,注意公共卫生,在较大城镇设立药房防治疾病,培养卫生干部和破除迷信,取缔巫神,以保证人民健康等五项措施。会上通过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号召:“发展卫生保健事业,以增进人民的健康”。

1939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卫生干部扩大会议上作了《发扬民族革命中卫生工作的精神》的重要讲话,肯定了边区卫生工作的成绩,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解决问题以及对待困难

应有的态度,阐明了卫生工作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针对当时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指出“卫生工作人员要想尽千方百计使得伤病员好,要在物资困难环境下,要在没有钱的环境下,把我们的给养医治办的好点,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自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军医处出版《卫生通讯》干部扩大会议特辑资料显示,针对敌人对边区的封锁,毛主席强调“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要用一切东西自己来造这个字段来答复敌人”。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讲话,为医务人员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增强民族自信心,鼓舞斗志,打败敌人,创建新中国指明了方向。

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造成人民对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均有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号召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党代会的这个决议,对推动和开展边区卫生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0年3月,党中央为了推动边区的防疫卫生运动,在边区召集了防疫会议。1940年5月31日《新中华报》资料显示,以后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主任。194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第四版开辟卫生专栏,由中央总卫生处主办,李富春同志撰写了发刊词。该栏目在宣传和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执行。在这个纲领的第十条条款中正式规定:“推行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苦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把卫生工作纳入政权建设的轨道。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经验,进一步号召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12月,他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1945年1月8日《解放日报》

刊载,在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又明确指出“卫生运动的开展和医药工作的加强,有赖于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与首长负责,因此,干部思想的打通就是这一工作的决定关键。大会要求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各级干部和边区各阶层人士,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切实纠正过去一切不重视卫生医药工作,不愿作卫生医药工作,对卫生医药工作必要的人力物力不予解决的错误态度。无论何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亲自动手,参加或帮助卫生医药工作的进行。今后各分区、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药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将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将成为联司考查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直接负责卫生医药工作的同志,尤应重视自己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减轻和消灭”。可以看出,当时边区政府已把卫生工作确实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抓。把卫生工作的好坏,作为考评各级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李富春就卫生工作发展的方向,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中西医合作,加强医药治疗与开展群众卫生工作;在普遍的运动中,抓住中心创造典型,反对平均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三个方面讲了卫生工作的方针。对卫生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全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的重要社论,社论强调“首先教育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使他们懂得推广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及自己对于减少疾病所应负的责任,反对对此责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开展全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基本前提”。要使各级干部都能重视卫生工作,这是卫生工作发展的关键。当时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和边区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边区落后的卫生面貌得到迅速改观,特别是积累了开展卫生工作的领导经验,制定了适合我国实际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 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努力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是边区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

卫生事业与人民利益休戚相关,它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时期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健康,对医药卫生工作的大政方针,始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使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到我们所采取的每项卫生政策和措施。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都是为群众着想的,领导机关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和落实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卫生工作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使医疗卫生工作充分发挥了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作用。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延安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变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并就提案中具体方法,民政厅经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制定了具体落实的措施。1943年傅连璋同志在中央总卫生处1944年3月1日《解放日报》指出:“卫生工作也要有群众观念及群众路线,卫生工作如果脱离了群众,一定是作不好的。卫生人员要善于作卫生调查,又善于把卫生调查所得集中起来,再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发挥力量。”

1944年11月经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的《关于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指出:“边区人民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支援战争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边区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受封建统治,直到现在,还遭受大量疾病死亡的严重威胁;这个威胁如不加以克服则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同时对战争与生产的努力也发生严重的影响。”把群众的卫生运动放在文化运动中之首位,认为解决不了疾病死亡对人民群众的严重威胁,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所以决议中强调指出:“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治疗,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对热心群众服务著有劳绩,或有新创造的医药工作者或卫生医药组织,应该予以

充分尊重和表扬,并推广他们的经验。”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号召“应该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要求医生等“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

李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指出:“边区人民有了政治经济的保障,但卫生医药尚没有保障,群众还被旧社会留下的野蛮的巫神和不卫生的习惯与疾病侵袭。如何给群众以医药卫生的保障,是边区医药界的大问题。边区的医生是革命的医生,应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应成为卫生方面的人民的救星”。1944年11月4日《解放日报》刊载他批评某些医务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观念,“有的人存在超人民的观点,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工作愿干就干,这阻碍了自己接近群众,不能把两脚站在为人民大众的立场”。

在1944年延安市举办的卫生展览会上,毛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题词不仅是对展览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指明了卫生工作的服务方向。

当时在延安的各级卫生组织和医疗单位,都能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毛主席让他的保健医生,为周围群众服务,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清凉山中央印刷厂卫生所阮雪华、白浪二位女医生,热心为群众看病,她们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也把她们看成自家亲人。她们被树立为边区模范医生。国际友人苏联医生阿洛夫,精通医术,热爱病人。他提出“一切为病人而工作”,而“不是为个人的前途而工作,而是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阿洛夫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作出显著的成绩,被评为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解放日报》长篇报道介绍他的事迹。1944年4月30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李富春同志在中直支书等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有医务所,就要进行群众医疗工作,各医务所要开座谈会讨论。每个医务所要学习清凉山医务所为群众的作风,要学习阮雪华、白浪同志为群众治病的精神。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个医院医务所的重要业务之一。医务干部做群众工作,是每一个医务战线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要作到不仅

是医务工作者,而且是最好的群众工作者。”

1944年6月6日,西北局办公厅召集在延安的医药卫生机构负责人会议,蔡畅同志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推进群众医药卫生,一切医务所都要为群众看病,培养医药卫生技术人才,深入广大农村。要求“医务工作者能真正为群众解决困难,能有充分的群众观点”。1944年8月13日《解放日报》记载徐特立同志指出:“我们的保健制度应该以广大群众为对象”。所以,在延安的所有医院都能主动热情地为群众看病。

1945年7月24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同志在《备荒中要进一步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一文中进一步强调:“要组织更多的医疗队、助产班和工作组更广泛地到农村中去,而且要在和群众联系及工作深入上更向前推进一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克服尚存在于个别医务工作同志头脑中看不起群众的观点”。及时选派医疗队、手术队下乡,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群众排忧解难,防病治病,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心,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医疗实践的本身。通过医疗服务,拓宽了党和群众联系的渠道,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是否有群众观点,决策是否能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群众,不仅是普及卫生知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性质所决定的。

延安和边区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面向工农兵群众,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出色的完成了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光荣任务,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3 始终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防疫工作是卫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就非常重视预防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我们党针对当时疫病流行猖獗,群众中迷信思想和不卫生习惯势力极为严重,缺医少药,死亡率甚高,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了以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培养了一支防治结合,以防为主

的卫生干部队伍,有效的控制了疫病在边区的流行,迅速改变了边区卫生面貌,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预防医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

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1937年3月在延安开展了卫生运动周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动员一千多人进行大扫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参加,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街头张贴大标语,组织56个流动宣传队,五十多人的宣传队,连续宣传了三天,使卫生工作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次卫生运动的规模之大在延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7年5月5日,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起,党中央机关与县政府等组织成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运动周的领导工作,并提出卫生工作的具体措施,要求在延安市建筑八个公共厕所,居民每家建立一座厕所,禁止卖病猪肉和死猪肉。举行大扫除,消除堆积在城内的垃圾等。这些要求都在短期内得到实现。

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指出:“在民主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卫生运动比过去有长足的进步,它表现在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大大的下降,表现在群众已能认识卫生对于他们的生活有深刻的关系,注意接受一般的关于卫生常识与设施的教育,更表现在群众对医药科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信仰”。这些成绩是党中央到达延安后,积极进行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扎扎实实开展卫生运动后取得的。

1940年3月,为推动边区防疫卫生运动,党中央曾在边区召集了防疫会议。1940年5月17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紧急防疫工作》的重要文章,号召共产党员在执行“卫生纪律中起模范作用,以推动广大群众一道遵守,使防疫工作能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收到预期的效果”。

为了使防疫工作能持之以恒,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成立防疫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八路军卫生部部长饶正锡,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璋等发起,在延安各界组织筹备防疫委员会,并于1940年5月26日正式成立

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中之最高领导机关,负责推进延安市、县境内防疫卫生运动。此外,还决定在各大机关单位,及区乡级按其具体情形之需要成立分会,兼承延安防疫委员会之领导。具体负责领导各单位之卫生防疫运动。1940年7月26日延安防疫委员会在总结防疫卫生工作时指出:“防疫运动的推动促使一般平时不注意卫生的人注意到防疫卫生的重要”,并已大大减低了疾病的比率,增加了卫生设施,为今后开展卫生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2年3月21日,总卫生部公布防疫标语,响亮的提出“预防重于治疗”。1942年6月2日,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景范为主任,该会为统一管理边区防疫工作之设计及指导机关。刘景范在1942年6月至10月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中,汇报了该会的成立及其组织,防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报告中指出:“在边区比较有组织有系统的办理防疫工作,这还属第一次,过去卫生机关多注重疾病治疗,而忽视预防工作”。这是在政府工作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克服重治轻防的思想。特别是通过防疫工作的实践,认为“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的能力与成效,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与统一的领导,同时需要全体公民对防疫工作有明确的认识,自觉的遵守与执行防疫法令才成。防疫工作是政权工作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只有政权的力量才能推行工作。”强调“加强预防工作,是每个卫生机关的职责,在各级行政负责人方面,亦应重视此工作,为必办的工作之一”。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已把防疫工作放在政权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抓。

1942年9月15日,《解放日报》在《加强干部保健工作》一文中,再一次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认为“预防胜于治疗,就是不叫人生病,那是上策”,并要求“各级卫生组织,从卫生部、处,直到卫生科、所,应把保健工作,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纠正过去重医疗轻保健的作风”。要“我们更主动的向疾病和死亡去斗争”。

边区防疫委员会在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指导下,作了大量工作,先后制定了有关防疫的计划和

管理传染病的规则,开展扎实有效的防疫运动。《解放日报》也及时刊载了有关宣传预防医学知识方面的文章,1942年11月12日发表了《重视防疫》的社论,1943年5月31日发表了《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文章等。这些重要社论及科普文章的发表,对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提高民众的防病意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解放日报》在《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文章中,总结了开展防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批评“一些卫生机关与同志,还没有认识清楚防疫工作的重心,还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只注意治疗,而不注意事先预防的观点”,认为“这是防疫工作的一个障碍。”要求“各个卫生行政的领导部门要纠正这种错误观点,不仅要认真治疗已患传染病人,而且主要的是要积极预防传染病的蔓延和发生”。

1944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一文中指出:“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以积极的预防为主,治疗为辅”。1945年7月24日《解放日报》指出,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要求“不论下乡的医疗队或当地干部进行卫生工作时,都必须掌握‘预防为主,医药为辅’这一方针,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发动广大群众讲究卫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党延安时期在卫生工作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1942年先后明确提出了“预防重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预防第一”的口号,并使之成为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由于边区各级卫生组织机构正确贯彻了这一方针,把边区卫生工作的重点自觉地转到预防为主上来,使边区卫生落后的面貌得到迅速改观。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预防为主方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一条搞好卫生工作的正确方针。我们将始终不渝的坚持之。

4 中西医学并重,积极倡导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努力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近代医学传入我国后,西医和中医两种医学并行于世。如何对待两种不同医学理论体系,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国民党当局主张限制进而消灭中医,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使中医在濒临灭亡之中挣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提出了

中西医要团结合作的卫生工作方针,使边区卫生界中西医之间出现了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共同合作,救死扶伤的卫生工作新局面。

为了使中国传统医学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1940 年 6 月 14 日边区政府召开国医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并正式成立了中医研究会,该会简章首次提出“国医科学化”的口号,明确中医中药的改良要趋向科学化,加强中西医之间的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1940 年 7 月 12 日《新中华报》在《从速开展边区卫生工作》一文中,要求“把边区的中医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科学的知识”。

1940 年 7 月,八路军制药厂编辑出版了《抗战新药集》,对中西药混合配制,有独到的见解,大都为国内首创。八路军卫生部部长饶正锡为该书写的序言指出,八路军制药厂“为我国的科学制药事业,经过摸索探讨的初步经验,奠定了中国新药学发展的基础。虚心接受先进的西方制药科学方法,批判的对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国产药材,洗去其神秘的传统,重新估评,给以科学化新药的适当地位”。序言对该厂科研工作成绩的评价,指明了边区制药工业应该在中西医药合作的基础上发展。1940 年 4 月 9 日,朱德、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到八路军制药厂视察,朱德为该厂题词:“你们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徐特立题词:“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否定其阴阳五行的神秘”。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是对制药厂的鞭策和鼓励。明确要求药学人员要吸取西药制药之长,挖掘中药之宝库,努力研制新药,实行中西药合作。认为中西并用,“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所以,边区在中西药合作并用的思想指导下,研制了一些特效药,大多为国内首创。所制药物不仅缓解了边区医药之缺,而且为我国新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创出一条新路子。

当时在延安的光华制药厂、中国医科大学、卫生部联合组建中西药研究室,探讨中药药理,研制新药品,取得一定成绩,充分调动了边区卫生界的积极性,为保障全体军民的身体健康服务,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1942 年 11 月 14 日《解放日报》记载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强调指出:“要消灭宗派主义倾向,团结全延安的医务工作者。”

1944 年 4 月 29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西医中医虽然在病理、诊断、疗法等方面有不同的学说,而且西医是更为进步的,中医是更为人多的,但这两者都只利于病人之生,不利于病人之死。”所以,“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

1944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他强调指出:“在医药方面,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 1000 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文教会组织中西兽医座谈会,主要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李富春同志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亲自主持会议,民政厅长刘景范介绍了边区的医药卫生情况。据统计边区各地共有 1074 个中医,54 个兽医,390 个中药铺,西医有 200 名,他们是边区医务界的主要力量,所以,“要消灭疾病和死亡,要反对巫神,必须中西医亲密合作。”会上国际友人傅莱发言,他说:中西医合作应是长期的,不仅仅是暂时的办法。对中医既不应完全否定,也不是完全肯定,而应加以批判的吸收。”这种认识颇为客观实际。李富春同志在座谈会上,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及边区卫生运动的方针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是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进一步指出“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

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李富春“从中西医理论与边区实际需要,反复说明中西医合作的重要,双方应打破门户之见,西医在合作中应负主要责任,要帮助研究与提高中医,并从而充实提高自己”。他指示应“成立延安中西医药研究会,吸收中西医兽医参加,经此会推动,产生全边区医药联合会,该会进行医理药理工作,并成为边区群众医药技术的领导机关”。来自1949年11月4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的口号。

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记载1944年7月13日,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号召边区中西医合作互助。他说,关于中西医合作的问题,“这是在外面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但在边区却有着不同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能彼此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的合作是有前途的。”

1944年9月30日,裴慈云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中西医合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过去中西医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派观点,相互轻视、歧视,单找对方的弱点,不愿看到人家的好处。这样实在足以阻碍中西医合作工作的进行。”“中医要学习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的知识、消毒办法和利用简易西药;西医要研究中医的处方、针灸方法和中药。”中西医“不是在于相互指责其缺点,而主要的是如何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必须合作,才能达到减少疾病死亡与增进人民健康之目的。把边区的卫生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经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就中西医合作的问题,作出具体要求。决议指出:“西医应主动的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技术好的医生尤应帮助教育技术差的医生进步。必须有计划的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

制造其他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在可能条件下组织群众的医药合作”。这里强调的是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亲密合作。

毛泽东还强调对中医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延安市政府为了促进中西医合作,曾召开了三次中西医合作会议。

1949年11月9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党和政府关于中西医团结合作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边区得到贯彻和落实,先后成立了延安县中西医研究会,三边分区中西医药研究会,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保健药社,国医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开展中西医药的合作和研究工作。在各级医院里实行中西医共同接诊会诊制度。延安时期著名的医家鲁之俊、朱璉等向老中医任作田学习,掌握针灸医术,取得显著成绩,被誉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鼓励。中医李鼎铭、毕光斗、裴慈云等主动学习西医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团结西医一道工作。在延安举办的卫生展览会期间,中西医共同接诊治病,做到了破除成见,交换技术,互相商量,公开秘方,提高治疗效果,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工作。

延安时期,我们党所提出的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卫生工作方针和“西医要中国化,中医要科学化”的口号,有效地调动和团结了广大中西医医务工作者,共同投身于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之中,为保障全体军民的身体健康,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特别是这个时期积累的有关中西医团结合作一道工作的丰富经验,为制定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今天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高人民的健康防病意识

陕甘宁边区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是一个文化极为落后的地区。在成立苏维埃政权初期,全区150万人口中,成年人有90%是文盲。由于文盲众多,文化水平低下,封建迷信思想乘虚而入,群众中愚昧落后的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不卫生的生活习惯造成流行病、传染病大量发生和蔓延。全边区西医百余人,中医千余人,而巫神竟达2066个。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指

出,“巫神利用迷信,欺诈群众,伤财害命。延安县共有200余巫神,对其中59个巫神致死人命进行调查,共治死278人。1944年1月4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49户300人口,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三斗零八合。可见反对迷信和巫神,已成为当时边区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开展了反对巫神破除迷信的工作。当时反对巫神的声势强大,坚持不懈。一方面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到巫神治不了病,有病要找医生;另一方面让巫神自己讲他们是怎样骗人害人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鬼神、天命。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的重要社论,号召各地党政军民坚决“取缔当地巫神的活动,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要人们“不信巫神,相信医药”。毛泽东尖锐的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945年边区二届参议会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总结了边区卫生工作的经验,认为“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的势力,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所以,巫神猖獗和群众的愚昧迷信思想,主要是民众文化水平低,没有卫生知识和边区缺医少药,巫神乘虚而入造成的。只有普及宣传医学科学知识,才能使群众自觉起来与愚昧、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延安和边区各级党政组织十分重视卫生宣传工作,组织和动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利用板报、歌谣、秧歌、戏剧、书面、庙会、展览等多样形式进行宣传,《解放日报》专门开辟卫生副刊专栏,先后刊载了大量医学科学科普知识,对群众进行卫生知识教育,增加群众的防病和健康意识。

1939年5月八路军军医处,为了加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保健工作,提高全体军民的健康水平,推动全国卫生工作,率先发起举办卫生展览会,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任主任。延安医药界和市青救会联合,于1941年5月15日至31日举办医药卫生展览会。中国医科大学为庆祝建校

十周年举办展览会,设有组织胎生室、解剖室、生理室、病理卫生室、外科室、皮肤花柳室、药物室、医大文献室等,参观者络绎不绝。1942年11月中央医院成立三周年,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卫生展览会,其中有介绍该院三年来的医疗成绩及如何防治各种常见病的连环图画,对增进卫生常识甚有裨益,参观者称道不止。1944年7月17日,延安市为开展卫生运动,增进军民健康,在杨家岭大礼堂举办卫生展览会,毛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全部展品皆以实物、图表、连环画、故事及各种统计对比,反复说明疾病的危害及如何防病的各种卫生常识,使观众清楚易解。展览会提醒大家对于疾病死亡的警惕和注意,要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邓颖超等领导在百忙中前来参观,给了许多赞扬和指示,认为这是推动卫生运动最有效的宣传办法,《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的文章。杨尚昆参观后,要求多动员战士及群众来看,并希望各地进行流动展览。展览会期间自杨家岭至南关的大路上,整日未断来往观众,据1944年7月23日《解放日报》资料显示,成群结队的机关人员和老百姓,带着希望的心情走进去,又带着满足和喜悦的面色走出来,因为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保护自己生命和健康的宝贵知识。先后参观者达万余人。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机关,利用各种机会,举办医药卫生展览会,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宣传在医药卫生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军民同疾病、落后、迷信巫神、不讲卫生习惯做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全体军民的健康防病意识,从而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这个时期,积累的医药卫生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是我们研究延安时期卫生事业发展史难得的珍贵资料。

6 为医务工作者树立学习榜样,培养政治上坚定,技术上精良的又红又专的医学人才

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了使医务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但制定了正确的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还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树立典型,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为边区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精良的又红又专的医务工

作者。他们在艰难困苦战争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怕流血牺牲,无私无畏,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只知奉献!奉献!永远无私地奉献!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他们忘却了疲劳,忘却了索取,也忘却了自己。

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表彰先进,奖励模范,宣传好人好事,《解放日报》也经常报道先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造成一种人人争先进,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良好气氛。

1939年11月12日,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世界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博士,在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送了花圈,挽词写着“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情”。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党和全体医务工作者学习白求恩大夫,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的精神,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12月1日颁发命令,决定将八路军总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抗日战争中,医院全体白衣战士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救死扶伤,忘我工作,精心地为每一个负伤患病的干部和战士治病。为了伤病员,他们七年没休过一天假,为了伤病员,他们牺牲了个人利益,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印度医生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2年12月9日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年仅32岁。延安各界于1942年12月30日举行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宣读祭文并讲话,军委卫生部政委饶正锡报告柯棣华大夫的英雄事迹。毛泽东在送的挽词中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对这两位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做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号召大家要向他们学习,这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又红又专的先进典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白求恩精神鼓舞下,边区卫生界涌现出了许多白求恩式的模范医生和模范护士,如国际友人马海德·阿洛夫,热爱病人,精通技术,打破保守观点,创造群众作风,提出“一切为病人而工作”。他们两人在医疗技术和行政管理上都创造了许多光辉的成绩,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清凉山卫生所模范医生阮雪华和白浪,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不避风雨,不管路途远近,主动为群众防病治病,群众把她们看成自家人,总卫生处模范护士顾杰群,体贴病人,刻苦学习,她愿以护士工作为终身事业,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和平医院模范护士李国文和刘增毅,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爱护病员如亲人,多次受到奖励。在中西医团结合作运动中,西医鲁之俊和中医任作田团结合作,互相学习,被评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模范。卜掌村崔岳瑞,反对巫神,破除迷信,讲究卫生,作出显著成绩,其事迹在边区农村得到广泛宣传,并搞了一个崔岳瑞运动。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的涌现,一大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精良的医务工作者茁壮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边区卫生工作的开展,形成了危险任务争着上,困难工作抢着干;宁愿自己吃苦,不让战友受累,以革命利益为重,同心同德团结协作的工作风气,大家都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他们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白衣战士应有的贡献。

边区医务工作者,在当时那种艰难困苦条件下,勤奋工作,不叫苦叫累,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忘我工作,其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了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使高尚的思想和精湛的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收稿日期:2019-10-21 编辑:文颖娟)